
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1}

——以上海1446 份农民工调查样本为例

顾梦蛟¹ 程名望² 史清华³

(1, 2. 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0092;

3.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200052)

【内容摘要】：农民工有序、平稳、持续地向城镇集聚是我国城镇化推进的必然环节，而城镇就业满意度是影响农民工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基于上海1446 份农民工调查样本数据和工作满意度理论，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表明：目前，样本农民工对整体就业评价偏向于“比较满意”。其中，农民工对“收入水平”最不满意，其次是“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最满意的是“社会治安”。但就影响的显著性来看，对总体就业满意度影响最为显著的是“工作环境”，最不显著的是“居住环境”。研究同时发现，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异质性使得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该研究对于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及城镇化道路的实现，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城镇化；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1309(2013) 12 — 0063 — 009

一、引言

1978 年以来，始于农村的改革给中国农村经济乃至整体经济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变革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进城务工，形成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对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陈钊和陆铭，2008；蔡昉，2010）。纵观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历史轨迹和演变趋势，无论是“民工潮”，还是“民工荒”；无论是“招工难”，还是“找工难”，都给经济发展或社会稳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中央政府十分重视农民工问题，2004 — 2013 年，连续10 个涉农“一号文件”都对农民工就业问题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党的十八大又进一步把城镇化作为未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要手段，并将农民工市民化作为中国城镇化推进的基本战略，从而将“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城镇化推进的必然环节，而城镇就业满意度是影响市民化的重要因素（黄祖辉等，2004；李永友和徐楠，2011）。

对于农民工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问题，国外学者们一致认识到城镇就业满意度对于农民工迁移的重要性，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部分学者关注了经济因素对农民工城镇就业选择及满意度的影响。例如：Knight & Yueh(2004) 研究

¹收稿日期：2012 — 11 — 15

了中国的情况，强调了收入对农民工的就业选择的重要性，并描述了农民工就业行为的某些特征。Raa & Haoran(2005)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的障碍因素，特别是考察了城镇资本、农民工工资等因素对农民工城镇就业行为的影响。但更多的学者关注于非经济因素。Erman等(2002)研究了性别因素对农民工城镇务工行为的作用，认为男性对城镇就业更为适应。Ahituv和Kimhi(2002)的研究表明，农民工对户口与社会保障等制度因素的满意程度会对农民工就业有显著影响。Majumdar等(2004)、Démurger等(2009)强调了城镇歧视导致的不满意感是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的重要障碍，认为“社会歧视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影响巨大，会对农民工形成心理困扰并产生不好的就业行为”。Goodburn(2009)关注了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认为生活在城镇的农民工子女，面临心理健康等很多不利因素，成为影响其就业满意度的重要因素。Cross(2008)、Yao(2010)等研究了农民工的健康问题，认为健康是农民工面临的重要问题。Mancinelli(2010)研究了教育、声誉或网络对于农民工城镇就业行为的重要影响，认为教育对于农民工就业行为的作用最为显著。Knight & Gunatilaka(2010)的研究表明，进城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水平比纯农村人口和城市本地居民都要低，并认为，市民化等融入城市行为可以给农民工带来“幸福感”，“幸福感”会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的适应性。Nielsen等(2010)使用个人福利指数(PWI)研究了福建省进城农民工的幸福感，并从生活标准、个人健康、人生成就、人际关系、人身安全、社区联系和未来安全等7个市民化指标测量了农民工城镇就业的满意度。和国外已有研究相比，国内的相关研究很不充分，且十分零散。程名望等(2006)较早认识到城镇因素对于农民工转移决策的主导作用，提出“城镇拉力是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的核心因素”的观点。孙永正(2006)研究证实了较低层次的基本需求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根本影响。薛翔(2007)对湖南、浙江和黑龙江三省的调查数据显示，外部报酬多少、技能培训情况、打工距离及其他因素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比较显著。许涛(2008)构建了4个影响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模型，结果显示教育状况、工作环境中的安全状况、劳动强度、工伤保险和自我认知状况等会显著影响工作满意度。刘辉(2007)对转型期农民工工作满意度进行研究，发现农民工队伍的构成发生了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凸现其工作特点，企业对其管理应更科学化和人性化。赵智晶、吴秀敏等(2010)基于成都市266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建立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测量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发现，工作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解释能力下降，劳动时间和工作环境对其影响能力上升。钱文荣和张黎莉(2009)对杭州、宁波、温州三地农民工的研究发现，家庭对工作产生的促进和工作对家庭产生的促进均与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文书和Smyth(2010)利用2005年全国12个城市的大样本调查数据，通过研究进城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的决定因素发现，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是进城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程名望等(2011)以上海1446份调查问卷为基础的实证分析表明：劳动保护、工作福利和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城镇就业行为及其满意度的影响比较显著。

结合以上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基于上海1446份农民工调查样本数据，结合作业满意度理论，采用因子分析和计量模型考察了城镇农民工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系列提高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政策性建议。该研究对于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及城镇化道路的实现，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数据来源与特征

为了对农民工在沪生存状态与就业状况有一个全面了解，2009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开展了一项以外来农民工为对象的实地调查。调查涉及农民工在沪的居住与出行、就业与子女教育、生活消费与城市认同以及相关政策执行等六个方面，共获取有效样本1446个。调查覆盖上海全部的中心城区和郊区，其中32.78%来自中心城区，67.22%来自郊区。从性别分布看，男性占60.58%，女性占39.42%。从年龄分布看(图1)，样本整体呈正态分布，其中年龄最大为62岁，最小为16岁，平均年龄31.80岁；从文化程度分布看(图2)，样本也呈现正态分布，小学及以下学历者占12.93%，初中占49.31%，高中占17.29%，中专及以上占20.47%。从来源地分布看，来源地涉及27个省(市区)，其中样本集中度超过20%的省有两个，一是安徽，占27.04%，二是江苏，占20.54%。从以上样本特征分布看，该样本数据具有较好的统计学特征，适合进行统计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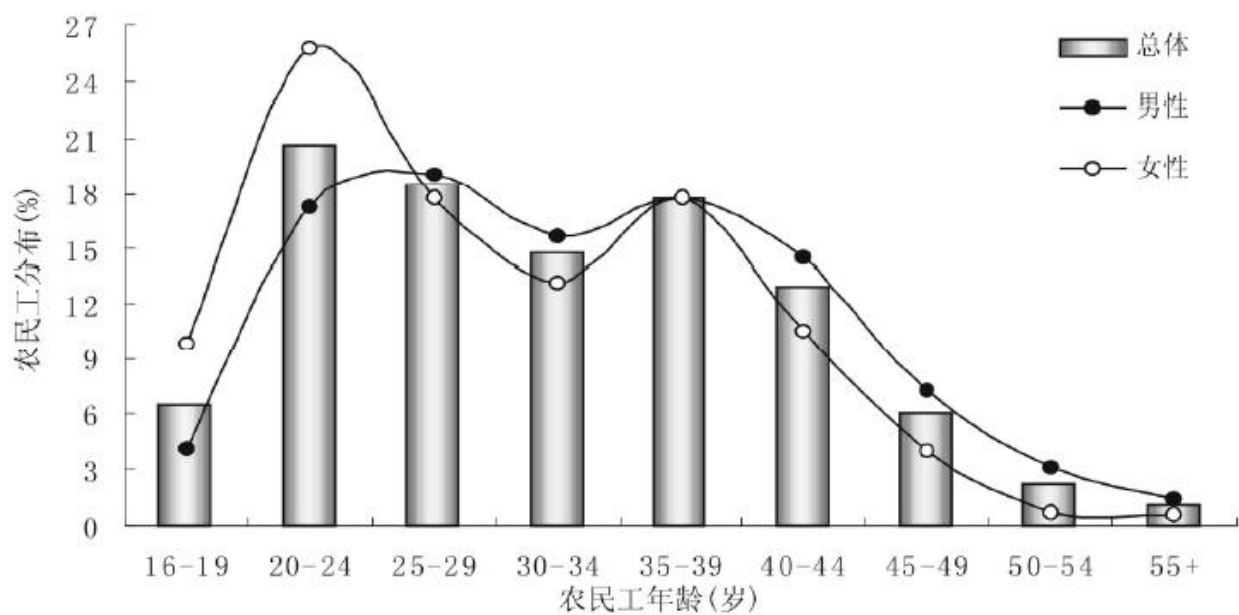


图1 样本农民工的年龄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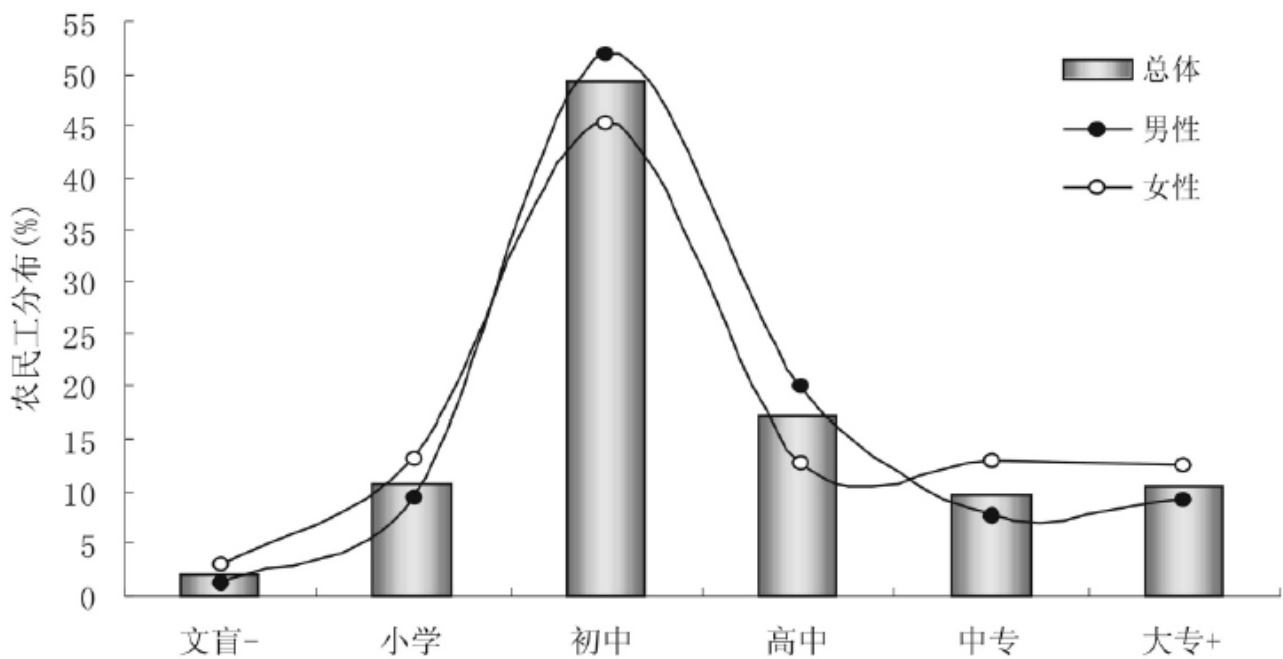


图2 样本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分布

(一) 总体就业满意度评价

总体就业满意度评价及其比例分布见表1。在均值分析中，量表为5级评分法，根据李克特(Likert)量表的方式对变量进

行测量，将“非常满意”、“比较满意”、“感觉一般”、“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分别赋值为“1”、“2”、“3”、“4”、“5”。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71，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3分为中间状态即理论中值，由于该分析是逆向赋值，小于3分为满意状态，大于3分为不满意状态。就就业满意度整体状况来看，样本农民工城镇就业整体满意度均值为2.15，小于理论中值3，这表明样本农民工对整体就业评价偏向于“比较满意”。就比例分布看，“比较满意”的比例最高，为55.3%；其次是“感觉一般”，为28.0%；最低的是“很不满意”，仅为0.1%。由此可见，随着国家对农民工问题的日益重视以及系列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农民工城镇就业环境和条件日益改善，其就业满意度显著提高，特别是“很不满意”的比例极低。

（二）结构性满意度评价及分析

根据调查问卷，对于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细分了城镇工作环境、居住环境、社会治安、收入水平满意度评价4个结构变量。4个结构变量的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1。就表2-1的结果来看，在满意度评价的4个结构变量中，得分最高的是“收入水平”，为2.84分；其次是“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分别为2.63分和2.29分；最低是“社会治安”，为2.26分。就比例分布看，“非常满意”比例最高的是“社会治安”（15.7%），“比较满意”比例最高的是“社会治安”（52.3%），“感觉一般”比例最高的是“工作环境”（33.0%），“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比例最高的均是“收入水平”，其比例分别为14.6%和4.2%。因此，该实证分析表明，在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构成要素中，目前农民工对“收入水平”最不满意，其次是“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最满意的是“社会治安”。

表 1 城镇农民工总体就业满意度描述

均值分析		比例分布(%)				
均值	标准差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感觉一般	不太满意	很不满意
2.15	0.68	15.4	55.3	28.0	1.2	0.1

数据来源:上海农调队农民工情况调查(2009)

表 2-1 结构性满意度评价及比例分布

结构变量	均值分析		比例分布(%)				
	均值	标准差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感觉一般	不太满意	很不满意
工作环境	2.29	0.68	9.9	54.2	33.0	2.8	0.1
居住环境	2.63	0.84	7.3	36.2	45.0	9.0	2.6
社会治安	2.26	0.85	15.7	52.3	23.8	7.0	1.2
收入水平	2.84	0.88	4.5	30.1	46.6	14.6	4.2

数据来源:上海农调队农民工情况调查(2009)

（三）个体异质性与满意度评价

以上的分析是总体分析，基于农民工个体异质性的深入分析，将有利于对不同特性农民工的城镇就业满意度做出更清晰的认识。分析结果见表2-2。

就样本个性特征看，性别间的评分有差异，男性农民工给出的分值明显低于女性，但在居住环境方面，女性的评价分值则要低于男性。这表明，男性农民工就业满意度总体高于女性。年龄间的评分也有差异，总体看，随着农民工年龄的增长，给出的满意度分值呈明显下降趋势，说明年纪越大，农民工就业满意度越高。文化程度间的评分同样存在差异，总体看，随着样本文化程度的提高，给出的各项评分呈现一种以小学文化程度为峰点的上升趋势，说明教育水平太低和太高的两端农民工城镇就

业满意度较低。特别是在全部测评项目中，收入水平一项在中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中较高，这意味着拥有较高学历的农民工在沪就业对收入水平满意度是一种不及格状态。

就8个主要农民工来源地看，来自浙江的农民工给出的满意度评价是最高的，而最低的是来自河南的农民工样本。就各具体单项评分来看：工作环境江西农民工给出最高，居住环境河南农民工给出最高，社会治安江苏和安徽农民工给出最高，收入水平湖北农民工给出最高。这表明，不同来源地的农民工，对于城镇就业满意度有不同的评价。总的来看，靠近上海的浙江、江苏、安徽一带的农民工在沪务工的满意度较高。

就居住地比较看，居住在城区的农民工的总体满意度相对较高。工作环境、居住环境以及收入水平等单项评分中居住在郊区的给出分值明显低于城区，而社会治安的评分，城区低于郊区。这表明，不同居住地的农民工，对于城镇就业满意的评价有一定差异，城区农民工的满意度总体高于郊区。

四、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以上分析均是基于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评价的统计性描述分析，要找出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规律性影响因素，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因子分析和计量检验。

表 2-2

在沪农民工的满意度评价 单位: 分

	总体	工作环境	居住环境	社会治安	收入水平
男性	2.05	2.23	2.16	2.22	2.09
女性	2.22	2.18	2.19	2.02	2.20
16 ~ 24	2.37	2.23	2.15	2.03	2.37
25 ~ 34	2.24	2.19	2.06	2.11	2.28
35 ~ 44	2.09	2.20	2.25	2.25	2.08
45 岁 +	2.04	2.25	2.33	2.24	2.07
文盲 -	2.23	2.05	2.08	2.02	2.00
小学	1.98	2.25	2.35	2.24	1.96
初中	1.99	2.22	2.21	2.16	2.04
高中	2.16	2.18	2.06	2.13	2.25
中专	2.18	2.15	2.05	1.91	1.91
大专	2.26	2.23	2.09	2.19	2.38
江苏	2.10	2.17	2.17	2.03	2.31
浙江	2.05	2.34	2.42	2.29	2.13
安徽	2.08	2.20	2.06	2.03	2.14
江西	2.12	2.13	2.26	2.23	2.09
山东	2.28	2.30	2.24	2.21	2.02
河南	2.32	2.21	1.97	2.18	2.15
湖北	2.22	2.18	2.17	2.16	2.38
四川	2.21	2.26	2.26	2.25	2.24
城区	2.12	2.12	2.11	2.2	2.17
郊区	2.16	2.25	2.19	2.11	2.15
#闵行	2.04	2.15	1.99	1.87	2.32
#浦东	2.41	2.47	2.29	2.38	1.99
总体	2.15	2.01	1.67	2.04	1.46

注: 1. 满意度分值采用逆序赋值: 非常满意 1 分, 比较满意 2 分, 一般 3 分, 不太满意 4 分, 很不满意 5 分。2. 资料来源: 上海农调队农民工情况调查 (2009)。

(一) 因子分析

问卷共选取了工作环境、居住环境、社会治安、收入水平 4 个结构变量, 但这 4 个结构变量是否能较好的反应了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 从统计学视角看, 需要做因子分析。具体来看, 需要做 2 个检验, 一是这 4 个变量和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相关性; 二是这 4 个变量是否是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核心影响变量。第一个检验, 需要做皮尔森相关性分析 (Pearson Correlation); 第二个检验, 需要做 KMO (Kaiser-Meyer-Olkin) 检验和 Bartlett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检验。

1. 皮尔森相关性检验分析

皮尔森相关性分析表明 (表 3), 工作环境、居住环境、社会治安、收入水平四个变量与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相关性都十分显著, 单尾检验 (1-tailed) 均在 1%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其中, 工作环境的相关性最为显著, 皮尔森相关性为 0.45,

其次是收入水平和社会治安，最后是居住环境，其皮尔森相关性分别为0.34、0.33和0.31。同时，4个结构变量之间也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单尾检验(1-tailed)也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其中，显著性最高的是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之间，其皮尔森相关性为0.40；最低的是居住环境和社会治安之间，其皮尔森相关性为0.23。该结果较好的表明，首先，4个结构变量和总变量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对于结构变量的分析能较好的反应总变量的特征和变化趋势。其次，结构变量之间的显著相关则表明，影响总变量的因素比较复杂，其结构变量之间存在着交互影响，需要进一步通过计量分析做出辨析和分解。

表3 变量间的相关性检验(Pearson Correlation)

	总体满意度	工作环境	居住环境	社会治安	收入水平
总体满意度	1	0.45***	0.316***	0.33***	0.34***
工作环境	0.45***	1	0.40***	0.24***	0.38***
居住环境	0.31***	0.40***	1	0.23***	0.39**
社会治安	0.33***	0.24***	0.23***	1	0.31***
收入水平	0.34***	0.38***	0.39***	0.31***	1

注: 1. 相关系数为皮尔森相关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 “***”表示单尾(1-tailed)检验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2. 资料来源: 上海农调队农民工情况调查(2009)

2. KMO 检验和Bartlett 检验分析

KMO 检验和Bartlett 检验是确定问卷数据是否适合用于因子分析所采用的主要统计学方法。通过对满意度评价的四个结构因素(工作环境、居住环境、社会治安和收入水平)进行KMO 检验和Bartlett 检验, 能较好的判断这四个结构因素对总体满意度的代表性和适合性程度。KMO 检验和Bartlett 检验结果如表4 所示。在表3 中, KMO 检验值为0.714; 同时, Bartlett 检验给出的相伴概率为0.000, 小于显著性水平0.01, 因此在1%显著性水平上拒绝Bartlett 球度检验的零假设。该结果说明4 个结构变量是能够对农民工就业满意度进行良好解释的因子。

表4 KMO 检验 and Bartlett's 检验结果

检验类型	检验值
Approx. Chi-Square	781.402
Bartlett 检验	Df
	6
	Sig.
	0.000
KMO 检验值	0.714

数据来源: 上海农调队农民工就业状况调查(2009)

(二) 计量分析与验证

在相关性分析、以及KMO 检验和Bartlett 检验的基础上, 已经得出结论: 工作环境、居住环境、社会治安和收入水平4 个因素是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核心因子(因素)。但这4 个核心因子, 哪个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影响最显著, 需要进一步做出计量分析。以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Y)为被解释变量, 工作环境(work)、居住环境(live)、社会治安(safe)和收入水平(earn)4 个因素为核心解释变量, 加入个性特征控制变量, 包括: 性别(gender)、年龄(age)、文化程度(edu)、婚姻状况(marriage)和健康状况(health), 建立计量模型如下:

$$Y = \beta_0 + \beta_1 \text{work} + \beta_2 \text{live} + \beta_3 \text{safe} + \beta_4 \text{earn} + \beta_5 \text{gender} + \beta_6 \text{age} + \beta_7 \text{edu} + \beta_8 \text{marriage} + \beta_9 \text{health} + \mu$$

在该模型中， μ 表示随机误差项。

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模型的F 值较大(68.5435)，表示所建立的模型整体上具有很强的显著性，R-squared 的值为0.3005，一方面说明了该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另一方面说明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Y)的因素十分复杂，还有一些因素没有被本模型考虑到。就解释变量的显著性看：

1. 4 个核心变量的系数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所选定的4 个结构性变量是影响农

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其中，显著性最强的是“工作环境”，其次是“社会治安”和“收

入水平”，最后是“居住环境”。首先，工作环境是目前影响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第一因素。农民工进城，工作是其首要目标和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工作环境是否优良，工作是否顺心，必然是影响其满意度的核心因素。例如：在调查中，工作时间是否能忍受、工作中是否被歧视、工资是否能按时发放、对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适应性等系列基于工作环境的因素，都被调查者高度关注。其次，居住环境在4 个结构性因素中显著性最低表明，农民工对于城镇居住环境的要求并不高，对于较恶劣的居住环境有较高的容忍度，只要“有地方住”，他们就知足了。

2. 在5 个基于个性特征的控制变量中，除了健康状况外，其余4 个变量均在5% 或1%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具体来看，年龄较大、学历越高、女性比男性、已婚比未婚的农民工，就业满意度较低。该结论和Clark 等(2008)的研究一致；而与高文书和Smyth(2010)的研究结论差异较大，高文书和Smyth 的研究表明，除了健康以外，教育、性别、婚姻等变量对农民工城镇就业和生活的满意度均不显著。

表 5 计量模型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Y)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 值	p 值	
常数项(C)	0.5529	0.1335	4.1423	0.0000	
核	工作环境(work)	0.3245***	0.0252	12.8835	0.0000
心	居住环境(live)	0.0714***	0.0204	3.4948	0.0005
变	社会治安(safe)	0.1422***	0.0190	7.4681	0.0000
量	收入水平(earn)	0.0802***	0.0200	4.0042	0.0001
	性别(gender)	0.1020***	0.0313	3.2618	0.0011
解	年龄(age)	0.0102**	0.0044	2.3340	0.0197
释	文化程度(edu)	0.0282**	0.0138	2.0359	0.0419
变	婚姻状况(marriage)	-0.1323***	0.0345	-3.8306	0.0001
量	健康状况(health)	0.0347	0.0495	0.7006	0.4837
R-squared		0.3005			
Log likelihood		-1239.18			
Durbin-Watson		1.7507			
F-statistic		68.5435			

注：1. 数据来源：上海农调队农民工就业状况调查(2009)；2. 所用分析软件是EViews6.0；3. “*”、“**”、“***”分别表示结果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五、结论与评述

2004 — 2013 年,连续10 个“一号文件”的出台标志着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而“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和城镇化战略的根本实现,离不开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顺畅转移,特别是从“候鸟式”的转移到“生根式”的迁移。本文从城镇就业满意度的视角研究了城镇因素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目前农民工对整体就业评价偏向于“比较满意”。其中,农民工对“收入水平”最不满意,其次是“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最满意的是“社会治安”。但就影响的显著性来看,对总体就业满意度影响最为显著的是“工作环境”,最不显著的是“居住环境”。这表明,目前,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既有工资收入等物质因素,也有居住环境、社会治安等非物质因素。但比较而言,物质因素更为显著,工资收入等物质因素还是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核心因素。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农民工对城镇就业的要求总体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物质需求是其第一需求。因此,“民工荒”的出现,可能是企业受到成本约束而不能很好的满足农民工的物质需求引致的。于是,城镇要应对“民工荒”,要更好的吸引农民工,关键还是要满足农民工的物质需求,给予农民工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例如城镇企业要提供给农民工以较高的工资水平。同时,城镇相关部门也要关注农民工在城镇的生存状态,注重完善和调整针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政策,特别是在工作环境、居住环境方面给予更好的改善,以适应进城农民工的要求。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收入水平是农民工城镇就业最不满意的因素,因此,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是提高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的核心途径之一。首先,考虑到目前女性农民工收入水平显著低于男性农民工,且女性具有一定的弱势性,所以要特别要注重提高女性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其次,提高城镇农民工就业满意度不能仅仅局限于提高农民工工资,还应该关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按时支付农民工工资,使农民工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相适应等综合因素。最后,考虑到农民工理性的通过与他人比较或根据是否达到自己的预期来衡量收入水平,以此确认收入水平满意度,因此,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满意度还要兼顾公平,要尽量缩小农民工之间的收入差距,防止收入差距扩大化。

2. 工作环境是最显著的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因素,因此,改善农民工的工作环境,是提高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的另外一条核心途径。对于工作环境,既要保证农民工的人身安全、工资支付,还要关注其身心愉悦;例如避免超负荷的工作时间、提供较好的劳动保护和工作福利等。以工作时间为例,从本次调查的结果看,在沪农民工2009 年平均周工作日达到5. 61 天,日工作时达到8. 84 小时,分别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标准高出12. 23% 和10. 50%。该数据表明,目前农民工面临着并不友好的工作环境。

3. 本文的研究同时表明,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异质性使得农民工的城镇就业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促进农村劳动力永久性迁移到城镇,需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加强农村的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劳动力总体素质,增加其在城镇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将有利于其更好地在城镇就业。长期以来,政府部分对教育的投资严重不足,且教育投资一直向城镇倾斜,导致农村的基础教育严重滞后,影响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并加剧了农村的贫困(陈钊和陆铭,2008)。因此,必须重视农村的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问题,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基础教育办学模式,不断改善农村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以教育为突破点,随着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其城市就业和生存能力不断增强,将促进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和城镇化目标的最终实现。

参考文献:

1. 蔡昉. 刘易斯转折点与公共政策方向的转变——关于中国社会保障的若干特征性事实[J]. 中国社会科学,2010(6): 125 — 137.
2. 陈钊, 陆铭. 从分割到融合: 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 [J]. 经济研究, 2008(1): 21 — 32.

-
3. 李永友, 徐楠. 个体特征、制度性因素与失地农民市民化 [J]. 管理世界, 2011(1) : 62 — 70.
 4. 黄祖辉, 钱文荣, 毛迎春. 进城农民在城镇生活的稳定性及市民化意愿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4(4) : 68 — 73.
 5. 孙永正. 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实证分析 [J]. 中国农村经济, 2006(1) : 42 — 48.
 6. 薛翔. 企业内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J]. 科技和产业, 2007(2) : 36 — 39.
 7. 许涛. 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J]. 南方人口, 2008(3) : 24 — 31.
 8. 程名望, 史清华, 徐剑侠.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因与障碍的一种解释 [J]. 经济研究, 2006(4) : 46 — 56.
 9. 刘辉. 转型期农民工工作满意度问题对策研究 [J]. 经济问题探索, 2007(9) : 68 — 70.
 10. 赵智晶, 吴秀敏, 陈珂宇, 等.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实证分析——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研究 [J]. 四川农业大学学报, 2010(6) : 245 — 252.
 11. 钱文荣, 张黎莉. 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及其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J]. 中国农村经济, 2009(5) : 18 — 23.
 12. 高文书, Russell Smyth. 未来收入预期与进城农民工生活满意度——对上海等12个城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10(6) : 3 — 10.
 13. 程名望, 史清华, 潘烜. 劳动保护、工作福利、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城镇就业 [J]. 统计研究, 2012(10) : 73 — 78.
 14. Avner Ahituv & Ayal Kimhi. Off — farm work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decisions of farmers over the life — cycle:the role of heterogeneity and state Dependence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2, 68(2) : 329 — 353.
 15. Sumon Majumdar, Anandi Man, Sharun W. Mukand. Politics, Information and the Urban bias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4(75) : 137 — 165.
 16. Sylvie D murger, Marc Gurgand, Shi Li, Ximing Yue. Migrants as Second — class Works in Urban China a Decomposition Analysis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9, 37(4) : 610 — 628.
 17. John Knight, Ramani Gunatilaka. Great expectations the Subjective Well — being of Rural urban Migrant in China [J]. World Development, , 2010, 38(1) : 113 — 124.
 18. Nielsen, I. , Smyth, R. and Zha, i Q. Subjective Well — being of China's off — farm Migrants[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0, 11(1) : 23 — 34.
 19. Charlotte Goodburn. Learning from Migrant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Schooling of Rural Migrants Children in Beijing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2009, 29(5) : 495 — 504.

-
20. E Susanna Mancinelli, etc. Education, Reputation or Network Evidence on Migrant Worker Employability [J] , Journal of Socio — Economics, 2010, 39(1) : 64 — 71.
21. Paul Cross, Rhiannon T. Edwards, etc.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Migrant farm Worker Health in Conventional and Organic Horticultural Systems in the United Kingdom [J] ,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08, 39(1) : 55 — 65.
22. Tahire Erman, etc. Money — earning Activities and Empowerment Experiences of Rural Migrant Women in the City: The Case of Turkey [J] , Women' 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002, 25(4) : 395 — 410.
23. Thijs ten Raa & Haoran Pan. Competitive Pressures on China: Income Inequality and Migration [J] .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05, 35: 671 — 669.
24. Yao Lu. Rural — urban Migration and Health: Evidence from Longitudinal Data in Indonesia [J] ,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0, 70(3) : 412 — 419.
25. Clark AE, Frijters P, Shields MA. Relative Income, Happiness and Utility: An Explanation for the Easterlin Paradox and Other Puzzles [J] .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8, 46(3) : 95 — 144.